

湖南新时期 10 年

优秀文艺作品选

文艺理论卷(下)



I218.64

2
3:2(2)

B25(101)

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

文艺理论卷 (下)



湖南文艺出版社

D14030

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
文艺理论卷(下)

责任编辑：谢 引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插页：5

字数：381,000 印数：1—1,400

平装：ISBN 7—5404—0583—x
I·474 定价：6.20元

精装：ISBN 7—5404—0584—8
I·475 定价：7.70元

《湖南省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

丛书编委会名单

顾问：刘正 夏赞忠 胡代炜

主编：周特新 文选德

副主编：（按姓氏笔划排列）

未央 任光椿 吴兆丰 陈满之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沙	王以平	文选德	冯放	未央
甘树森	叶梦	白诚仁	弘征	刘孝纯
刘鸣泰	刘振球	江学恭	任光椿	伍振戈
孙健忠	宋梧刚	李元洛	李青田	杨胜群
吴兆丰	肖建国	谷曼	何共淮	陈白一
陈健秋	陈满之	张天明	张自华	张兆旺
张益华	范正明	周汉平	周峥嵘	周特新
周健明	金汉珊	金振林	胡英	胡光凡
骆之恬	铁可	崔合美	谢璞	蒋燕
储声虹	雷鸣	谭谈	黎维新	魏委

现代文学

鲁迅前期思想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李桑牧

作家的世界观总是深深地渗透在他的创作中，深切地、具体而微地透过各个不同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艺术形象的研究固然不能离开世界观的研究，然而，从艺术形象的研究中却又每每更能深入具体地认识和把握作家的思想立场和思想特征。我在对于鲁迅创作的研究，特别是对“五四”运动前后新型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中，发现前期的鲁迅已取得了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他的前期思想具有民主觉醒阶段的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战斗实践中的发展性质。

一 鲁迅前期思想的阶级实质

我在1959年的《心灵的历程》一书中曾说，前期的鲁迅有他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就因为这一点遭到姚文元及其论点的追随者激烈的反对。原因就在于姚文元在《巨人》一书中断定鲁迅前期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这样的质问：“难道在意识形态上和资产阶级属于同一范畴的小资产阶级，唯独其中的伦理观点会和资产阶级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吗？难道世界上真有一种既不革命

也不反革命的第三种人道主义吗？”这质问把他们的观点表达得很明白。在他们看来，全体小资产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全体小资产阶级都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中立群众。

我很反对把前期的鲁迅说成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前期的全部著作都体现出他那鲜明的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立场。

毛泽东同志在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时，曾经精确地分析了一个介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即半无产阶级。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农村中，绝大部分半自耕半租佃的农民，能勉强维持生活和不能勉强维持生活的佃农，都属于这个阶级；在城市中，备受贫困压迫和失业的恐怖，背着沉重生活担子的小手工业者，薪资微薄的店员和本少利微的小贩都属于这个阶级。毛泽东同志对于半无产阶级各个阶层群众的革命性都作了分析和比较，使我们懂得这些城乡半无产阶级是具有革命坚决性的苦难的劳动群众，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支柱。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这篇文章中谈到1848年柏林革命时说的一段话，也有助于我们对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认识。他说：“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城市居民，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实际上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贫困底层，他们在利益和思想上是和无产阶级相近的。我觉得，称他们为半无产阶级，是为了把他们和一般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如果在显示他们和无资产阶级的区别的情况下，另外称之为革命小资产阶级也是可以的。由此可见，半无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贫困底层在利益思想上既和无产阶级相近，那就决不能把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

识形态等同起来，看作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中立者。在民主觉醒的历史阶段，半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有他们的革命的政治愿望，也有他们的革命的道德理想，就是说有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也有和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相适应的革命人道主义。由于鲁迅前期所表现的革命英勇性和坚决性，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彻底性和对民主主义认识的深刻性，显示出他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的范畴，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利益。所以，他是站在与无产阶级相近的半无产阶级广大劳动群众的立场，他是被压迫劳动人民的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因而在“五四”时代的思想战斗中，他也就能够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其新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绅士们实行英勇的进攻，我们从他的著作里可以看到他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鲜明的革命人民的立场。

二 关于鲁迅前期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

鲁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黑暗混乱的现象中看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腐朽性和虚伪性，但又没有认识无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民主，因此，他所愿望的便是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利益的新的民主局面。这个新的民主愿望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大特色，是肯定新的民主主义的所谓“人国”只能建立在国人普遍觉醒的基础上，又必须由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觉善斗之士来领导，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民主共和的实现。

鲁迅的早期，实际上是他前期世界观的形成阶段，只有到了“五四”时代，鲁迅的人道主义才在新的思想战斗中闪出了耀目的光辉；在当时提倡新道德的战斗者中，唯有鲁迅是最深刻地揭露和

最猛烈地抨击了仁义道德美名之下的吃人的实质，也唯有鲁迅是最热情地宣扬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将来”；这已经充分显示出他的人道主义的深刻，丰富，不同凡响。

虽然鲁迅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对于他的这个“人道主义终当胜利”充满信心，但可以看出，这个按照道德理想所提供的未来世界的蓝图，既具体而又朦胧，既崇高而又玄虚，完全是细小的小生产经济土壤中的产物。因为是以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实践为基础，而又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思想，所以具有民主改革的新内容，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劳动人民的新向往，所以显得崇高而又具体，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思想。但是，他们要消灭任何一种吃人的现象，任何一个吃人的人，显然又不过是对于民族民主革命前程的理想化的结果。其实，对于革命前景的全新的具体的规划，非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也不可能发现潜伏在他们这个未来理想中的资产阶级内容，因而思想家的鲁迅也只能沉湎于道德的革新，纯粹思维范畴的美梦，这就又使他的未来理想显得茫远而朦胧了。半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反映了对于平分土地、对于有保障的生活、对于互相帮助共同致富的经济要求，如果这种经济要求在一个时期内得以实现，那么，从这个经济土壤中所生长的，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空前新颖的社会关系，显然是令人振奋的。可见半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正象他们的民主主义一样，反映着这个阶级的进步性，也反映着这个阶级的局限性。

半无产阶级受到残酷的压迫，有自由平等的渴望，对同一境遇的人也充满爱和尊重的道德感情。他们的道德原则，正如鲁迅在“五四”时代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个个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这个自他两利的道德原则就鲜明地告白了这个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矛盾。

鲁迅着重抨击了“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剥削阶级“畸形道德”，提倡“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就表明半无产阶级所偏重、所强调的是利他的方面，他们关心同命运兄弟的利益，极端憎恶损人利己的作风，这是和无产阶级道德精神相近的。正因为强调利他的方面，而又并不讳言利己的要求，也如鲁迅所说：“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所以，他们也考虑个人利益，不能驱除从细小的小生产经济土壤孳生的轻微的利己心，显示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原则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这样，半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就带上了这个阶级的特殊色彩。他们的自由平等是要求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和奴役的自由平等，同时又是带上了一定散漫性的各自为政的自由平等；他们所愿望的爱和尊重，虽然是同患相恤、同舟共济的阶级情谊的表现，但却不可能完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可能彻底打破个人与社会的对立。

三 关于鲁迅前期的个人主义

前期的鲁迅是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也是这个阶级的战斗的个人主义者。

鲁迅在1925年解剖他前期的思想矛盾时曾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两地书》第一集）鲁迅的自我解剖是深刻的，无情的，也确实触及了世界观的基本

矛盾的。当然，这时他受到思想的限制，而且自我解剖也有一个深化过程，在这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他所不甚了然的道理。

鲁迅对于个人主义的认识，是随着他的社会斗争的实践和自我斗争的实践而愈益深入的。在早期他就阐述过他的个人主义的战斗性，特别指出他所重视的个人主义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利己主义的同义语，他说：“箇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思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文化偏至论》）毫无疑问，如果把他所看重的个人主义理解为害人利己之义，那么，他对个人主义的宣扬也就看不到任何意义了。罗曼罗兰在谈到他的思想发展时，也对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作过同样的解释，他说：“在我的概念中的个人主义，是超越虚无主义的自私自利主义的范围的。”（《我走向革命的道路》，引自《译文》1955年1月号）而蔡特金在论述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时也指出，易卜生所描写和颂美的“高尚的人”是逗留在群众之中，自觉地担负“教育人民”的任务的，她因而指出：“易卜生的著名的‘个人主义’就是根源于这一思想并和严格的、积极的利他主义融合在一起的”。（《蔡特金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早期对个人主义的认识同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他把个人主义作为他的历史观的基本构成部分，正是因为他觉得个人主义是利他的而非利己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具有历史实践意义的缘故；但是，随着战斗的深入，他对个人主义的认识是逐渐深化了。

鲁迅是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要求，寻找个人主义的途径的。他在青年时代就把深邃的目光投向国人的精神世界，到东京后又开始了国民性问题的思索；从“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到“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的认识上的发展，显示出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日趋成熟。当他从国民精神中

发现了触目惊心的畸态，而又把这种精神畸态归结为所谓“民族根性”，认为“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随感录三十八》）这样，也就认为民族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国民精神的革新，这一艰巨任务必然地落在思想战士的肩上。在这时，鲁迅又注意到上世纪末西欧资产阶级没落期以尼采、叔本华、斯契纳尔、契开迦尔为代表的极端个人主义反动思潮，误认为“所谓神思宗之至新者”。这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剖析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和没落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区别时引用的一句古代罗马人的话：“两个人讲着同样的话，这就并不是一样的。”普列汉诺夫接着就说：“两方面‘对于少数的信仰’，也就并不是一样的。”如果说易卜生在挪威尚未形成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历史条件下，为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罪恶和小市民层的市侩主义，而寄希望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个人战斗，不同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反动思潮，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话，那么，鲁迅在封建主义统治着的中国，尤其是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为抨击黑暗、唤醒群众而提倡个性解放、个人战斗就更是具有积极作用了。但也应该看到，尼采等人崇奉主观，张皇意气，竭力夸大超群拔俗的个人的力量，甚至将它说成“意气绝世，几近神明的超人”，臆测他们在历史进化中旋乾转坤的作用；也确实使青年的鲁迅感到一时的眩惑，涌起“唯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的幻想，大大增强了对于个人意力的信赖，更加渴望地呼吁“精神界之战士”的诞生。

面对全民族愚昧落后的状况，鲁迅所找到的改革的途径，是依靠少数先觉善斗之士把人道主义理想的种子撒布人间，这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战斗的过程。因为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宣扬将惊醒传统的恶梦，启示美好的未来，使人“如睹晓日，益为之伟美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焉”。

(《摩罗诗力说》)这样，孤独战士必将遭到“思永保其故态”的统治阶级以及未经觉悟的群众的抵制、压抑和迫害。到了“五四”时代，鲁迅还强调他所提倡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封建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是水火不容的，他说：“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这样，寥若晨星的思想战士就会和“庸众”——包括统治阶级和未经觉悟的群众处于敌对的地位，而这也“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随感录三十八》)。他对于标榜独异的个人战斗予以鼓励，并且说：“他们必定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多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无论是在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之前，或是在党的幼年时期，鼓励觉醒的个人对黑暗的战斗，仍没有失去它的积极性，特别是指出个人的思想战斗仅是改革的“发端”，即传播新思想，使人们觉悟到“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的必要性，更是比较切实的估计。

这样看来，在“五四”时代思想斗争的实践中，他以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历史观是仍然闪烁着光辉的。但在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时代，人民革命力量不断成长不断发展，鲁迅前期的社会历史观也就必然会愈来愈显露出它的陈旧性，而可贵的是他象神话中的那个逐日者一样，忍渴忘倦、心坚志韧地紧追时代的脚步，而在战斗和追求中，他的弃旧图新的自我解剖、自我斗争也愈来愈深化了。

四 鲁迅前期思想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

当我们认识了鲁迅前期思想的基本特征，也就可以抓住他前

期思想的基本矛盾。在鲁迅自己看来，他前期思想“本含有许多矛盾”，而基本矛盾则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我们认为，这个解剖是相当深刻的。

必须清醒地认识，鲁迅前期的战斗实践，按其本质来说，是个人主义的。在这样的为民族和人民的命运而献身的孤军奋战中，显然是对战斗的个人主义这种实践思想的极严峻的考验。如果说在“五四”时代，鲁迅竭力鼓励孤独的战斗，并给予它很高的评价，那么，在“五四”以后，由于“五四”文化阵营在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分裂，由于“孤军”所承受的黑暗压力更加沉重，他虽然仍在鼓励“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但却看到了这类孤独战士往往为黑暗吞噬的“灭亡”的悲剧。正因为不害怕“灭亡”，所以他坚持孤独战斗，也鼓励孤独战斗；但“灭亡”的结局却告白了孤独战斗前途的阴暗，而不能不引起他的怀疑。

在自己的战斗实践中，他又体认到自己的战斗意气趋于冷却，产生了一些不利于战斗的消极情绪。例如他曾说由于战斗的艰难，使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自己所作的不过是所谓“绝望的抗战”；而对于将来，也慨叹“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两地书》第一集）。他觉得未经觉悟的群众对孤独战士的抗争采取冷淡、旁观的态度，仿佛“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娜拉走后怎样》）。有时甚至还加以歧视、嘲弄，产生敌意，这使战斗显得更加孤独、寂寞，而战士的内心也就涌起一种愤激的“憎人”的情绪。特别是在战斗中常为看不到明显的战斗效果而苦闷，以为投枪所到之处，“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战果是表面的，黑暗是难以击溃的，就这样单枪匹马地战斗下去，其结果必然是“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这样的战士》）。这就更加使他觉得希望的茫远，认为只能在“绝望的抗战”中，“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希望》）。诸如此类的虚无感、孤

独感和悲观失望的情绪迫压着他，侵蚀着人道主义理想照耀下的热烈、昂扬的战斗精神，以致于内心交织着充实与空虚，希望与失望，爱人与憎人，为人与为己，乐观与悲观的种种矛盾。

鲁迅正是通过自我解剖认识到交织于内心的这种种矛盾的，他的自我解剖的深刻性又不仅表现在他能够发现这些矛盾，而是更突出地表现在他能够发现种种不利于战斗的消极情绪都是在个人主义这个根子上产生的，从而也就把个人主义作为他思想矛盾的对立面。这个发现是极有价值的，这不仅有利于他的自我斗争的开展，而且对于同时代人的自我改造，也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历史已经跨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要求，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总根，正是这种在知识分子灵魂里埋藏得极深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的个人主义固然不妨看作是自私自利主义的同义语，即使是非无产阶级的被压迫劳动群众身上的战斗的个人主义，鲁迅也通过战斗实践中的自我解剖觉察到它那隐而不彰的利己的根茎。因而，他使我们看出，个人主义尽管有不同表现形态，但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也无论具有何种形态，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有害于革命的消极作用的。鲁迅的自我解剖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深入的程度，是和他战斗在无产阶级革命新阶段，并且善于汲取时代新的气流来弥补自己的缺陷相联系的；也是和他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毫无情面地，甚至带着诅咒自己的愤懑来解剖自己的严格态度分不开的。

我们已经认识到鲁迅的充满强烈民主政治内容的人道主义这种理想是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因素的，而战斗的个人主义这种历史实践思想则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而，鲁迅前期世界观的基本矛盾的实质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冲突。正如列宁在《左派民粹派在美化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说，

半无产阶级有“两个灵魂：无产阶级的和‘业主’的”。这样“两个灵魂”在半无产阶级身上不是截然分割，各自独立的，而是互相依存又彼此冲突的。思想家鲁迅的前期世界观就正处于这样“两个灵魂”矛盾交织的复杂状态，这大约也就是鲁迅在前期的自我解剖中还不甚了然的道理。

时代在大踏步前进，鲁迅的自我解剖也在不断深化；当他从无产阶级革命汲取了更多新的东西，特别是开始明确地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他对于个人主义这个内心敌人的追索也就愈来愈达到完全的主动和自觉。从鲁迅的自我改造和思想发展过程，我们可以领悟到，要把自己改造成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从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学习，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汲取思想力量；但只有不断深化的自我斗争自我解剖，不断发现、批判以至最终摧毁以个人主义为根源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才能真正和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

（原载《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从几篇小说看“五四”时期鲁迅 思想的高度

蔡 健

列宁同志曾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时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①无疑，这是英明的论断。鲁迅小说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但作品中反映出的有关革命的本质问题却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为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和总结。

现在让我们考察鲁迅小说创作较之他前一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家，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有什么不同和什么新的东西，来看鲁迅“五四”时期思想的高度。

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在残酷的封建主义统治下，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以及他们要求改变生活命运思想和情绪，历来引起一切善良人民的同情和关注。但在对待和解决这个问题上，是漠不关心，还是为之奋斗，争取解放？是用改良主义方式，还是走革命道路？一切革命政治派别和革命人们都得在这

^①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个问题面前受到检验。

也因此，凡是与时代、与社会生活、与广大人民命运有联系的艺术家的，都能寻找机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这个问题，只是由于时代以及作家思想情况的不同，表现出的思想高度也有所不同而已。

例如俄国19世纪后期的列夫·托尔斯泰就是这样一位关心农民生活命运的伟大艺术家。他在60年代所写的著名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80年代所写的世界名著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都能反映出1861年农奴制度改革前后这个时代最敏感的问题。但究竟由于他出身贵族，他是用人道主义观点看待问题，并企图通过改良主义道路解决问题。

《一个地主的早晨》描写了青年地主聂赫留道夫从“博爱”的胸怀、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一个早晨走访了几户自己领地的农奴家庭，希望通过自己的“施恩”，将农民从贫穷中“拯救”出来。农奴的生活，也确实如他所认识的、也如他这天早晨所见到的已走上了绝望的贫穷的边缘。他们的家是个什么样的家呀，住的大部分是将要倒塌的茅房；睡的，有的简直就蜷缩在灶头的角落里；有的人甚至连老母也无法奉养，聂赫留道夫走过时，一个老太婆正坐在门坎上大声吟呻，聂赫留道夫给了她一张钞票，悄声地说：“这儿的钱你自个儿拿去买点面包吃。”他们就是这样挣扎在贫穷的人生泥途中。

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不仅如此真实地反映了农奴制度下农民这种绝望、贫困的生活和命运，而且还深刻地反映了在这种生活命运下农民的思想情绪。人们看到那个白胖子达维德，他连麦在地里也没割，他既不愿为自己，也不愿为老爷好好地干活。尤赫万卡，他干脆就不给老爷服劳役。当“好心”的青年老爷建议那个最贫苦的楚里斯将半塌的草房拆除搬到新造的